

長春文史資料 7

末代皇后和皇妃

王 庆 祥

政协吉林省长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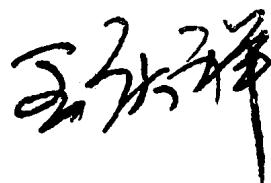
我从一九七九年起，根据组织安排，与溥仪先生的妻子李淑贤同志合作整理溥仪遗稿。我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有幸接触了溥仪先生的大量文稿，采访过许多与溥仪有关的人物，也查阅过包括档案和旧的报章杂志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从而不仅进一步认识了溥仪，也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中国末代皇后与皇妃。我感到：不但溥仪的后半生，包括他在婚姻生活方面的表现，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成果；而且溥仪前半生的婚姻生活，作为末代皇帝同他的后、妃之间的关系，也相当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王朝的腐朽与没落，因而也是值得记述传世的。我还感到：利用这些已知的材料，跟踪线索，继续发掘，有可能把我国末代皇后和皇妃的历史原型勾勒出来。由于在此以前，一切相关的书籍对她们都没有详细的记载；除现在健在的李玉琴写过回忆录，其余无非是一页半页而已。于是我不揣冒昧地动笔了。以为倘能有助于一些健在的知情者忆及更多的有用资料，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对史学界有一定参考价值；帮助青年读者认识中国封建制度和伪满帝宫的黑暗，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那就足够让人欣慰的了。

考虑到有利于保存历史真貌，在撰写时我尽量引录当事人回忆的资料原文，以使读者能利用原始资料自行引出结论。

凡入篇的文字笔笔有据，这是无疑的。但请读者注意：我们的目的仅仅是根据客观资料描出历史原型，一般不用更多的笔墨评头品足。自以为当作文史资料尚可，谈到人物传记，只有将来条件成熟时，再另行撰写成篇了。

在举世闻名的我国《二十四史》典籍中，入传的著名女性人物并非没有，只是太少了；这完全是因为妇女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地位低下的缘故，我们的史学家不应忽略她们，既要为那些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女性写传，又应记载具有各方面典型意义的妇女人物。她们的喜悦和哀怨，她们的理想和结局，都可能成为供后世研究的历史篇章。

爱新觉罗·溥杰先生，爱新觉罗·毓嶦先生以及他的妻子杨景竹，也为我撰写这几篇文字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我在撰写过程中又得到长春市政协领导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另外，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家磊同志、情报研究所所长贾玉芹同志以及东北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凡秀同志抽暇阅看了原稿，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仅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

脱稿于长春南湖新村

善史華生筆也
楊資政怨把卷
地車鑑冷桑花
廢興
甲子暮春
長春文史資料
溥杰

爱新觉罗·溥杰先生为本刊题诗

目 录

一 作 者 前 言	(1)
二 爱新覺羅·溥杰先生為本刊題詩	(圖版)
三 婉容、文秀、譚玉玲和福貴人的照片	(圖版)
四 末代皇后	(1)
五 淑 妃 文 绣	(57)
六 明 贤 贵 妃	(76)
七 有 福 贵 人	(98)

末代皇后

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象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

——爱新觉罗·溥仪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先后出现了二百一十九位“真龙天子”。这些人间帝王都有权广置“后宫佳丽”，因此才有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之说；拥有“嫔妃三千”的好色之君也是有的。然而，每代帝王大抵只立一位皇后，很少有立两位或三位的。所以，若论我国封建社会的皇后，也不过二、三百人罢了。

皇后，固然是嫔妃之中最尊贵的女性，在历史上也曾出现如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那样的“贤内助”，她们以自己的识见协助丈夫秉政治国；在历史上还曾出现如慈禧那样的皇后，利用自己的地位篡权窃国，成为中国大地的实际主宰者。然而，更多的皇后并不能以她们荣华富贵的胭脂掩埋哀怨的泪痕，她们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被污辱者、被践踏者、被玩弄者。同治帝的嘉顺皇后活活饿死在金壁辉煌的深宫之中，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例证。

婉容是紫禁城内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也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她的悲惨的一生告诉人们：那个吃人的制度怎样毁灭了数以万计的具有聪明才智的妇女。对于今天的女青年也能起到一点警诫的作用：如果有谁仍是一味孜孜以求地追逐名誉、地位和物质享受，那就绝不会赢得真正的爱情，而且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可悲的下场。这是溥仪先生在他的后半生中已经认识到的问题，也是我们立意要为婉容写一篇传记的原因。

公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旧历十月十三日），这是溥仪“大婚”的日子，也是清室的最后一次帝婚。就在这次大婚中，溥仪娶了一后一妃。皇后叫郭布罗·婉容，字慕鸿；淑妃就是文绣。

婉容是达呼尔族人，原籍在黑龙江省龙江县牤牛屯，其曾祖父长顺曾任清代吉林将军。其父荣源一直管理着祖传的房产和地产，在吉林省农安县就有土地近三千垧。其母爱新觉罗·恒馨是皇族毓朗贝勒的次女。婉容恰和溥仪同年，册封为皇后时年方十七。这位出身高贵的大家闺秀，是旗人中名闻遐迩的美人。她杏眼玉肌，黑发如云，婷婷玉立，姿色迷人。据当时能够接近皇后的人说，婉容不但相貌娇好，而且仪态不凡，举止端庄，谈吐文雅，琴棋书画样样都通，实在是一位百里挑一的有教养的才女。

不过，婉容的“成名”，不是因为美丽，也不是因为才气，而是在“皇后竞选”中获胜的缘故。关于那次发生在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的“选美活动”，溥仪的堂弟、载涛之子溥佳回忆说：

早在一九二一年，溥仪十六岁的时候，我五伯载沣、父亲载涛以及载泽与内务府大臣世续、“帝师”陈宝琛、朱益藩等，就相聚议论，谓“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宫”。大家同意后，又向溥仪及太妃们奏明，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即开始办理选后事宜。挑选的条件，必须是蒙古王公或满蒙旧臣家的女儿。

自从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我们家里简直是门庭若市，前来送“名门闺秀”像片的人往来不绝，并且还再三拜托我父亲，务必“玉成”其事。记得我父亲的书桌上堆集的照片，几乎可以装订成册了。消息传到了天津、沈阳，连徐世昌和张作霖也派人来提亲。只因当时有满汉不能通婚的限制，况且溥仪又是皇帝，所以都婉言谢绝了。

我父亲几次把这些照片送进宫去，供溥仪与太妃们挑选，均不如意，以致拖的时间很长。后来经过几番淘汰，只剩下了四家，即阳仓扎布（蒙古王公）、衡永（满族，曾任都统）、荣源（后任内务府大臣）和端恭（满族，额尔德特氏）。又经过仔细挑选，最后只剩下荣源的女儿婉容和端恭的女儿文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端恭的女儿文绣是由我六伯载洵和六伯母推荐，并得到了敬懿太妃的大力支持；荣源之女婉容是由我父亲推荐，并得到了端康太妃的支持。双方各不相让，于是形成僵局。我六伯与我父亲之间、敬懿与端康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一直拖到第二年春天，实在无法再拖下去了，就由我五伯拿着文绣、婉容的照片，到宫里请溥仪作最后的“圣裁”。不知溥仪是和我父亲的关系比较密切呢，还是由于其他缘故，他毫不犹豫地就指定荣源之女婉容为皇后。对于落选的文绣，王公、师傅们又经过商议，劝溥仪纳她为妃。据我所知，溥仪是本不愿纳妃的，大概是碍于敬懿与我六伯的面子，也就只好同意了。

溥佳的说法与溥仪自己所忆略有出入。据《我的前半生》一书所载，溥仪的“圣裁”不是在两人，而是在四人中间进行的。他说：“在我看来，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溥仪便“不加思索”地在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个铅笔圈儿。但是，端康太妃不满意，说文绣家境贫寒，长的不好，叫王公们劝溥仪重选，于是，溥仪又顺从地“在婉容的像片上画了一下”。结果自然又是喋喋不休的争论。折衷的办法便是立婉容为后，文绣为妃，她们两人的命运便这样决定了。

在溥佳的回忆中曾谈到，连当时军政界的实权人物，如徐世昌、张作霖也来提亲，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在一九二一年的旧报纸上找到一条关于清帝婚姻问题的消息，其中就谈到徐世昌提亲的事

情：

……襄岁本有人提议，以今大总统徐东海之女公子许配宣统，以东海名门与全国唯一无二之老世家，结秦晋之欢，本属门户相对，乃荏苒数年，尚未定局。

由此可见，婉容的“竞选”成功，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正中了我国古语中的一句话：“福兮祸所伏”。婉容的中选，恰是她人生悲剧的开场锣鼓。

婉容中选之后，便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猎取对象。因此，早在她入宫之前，就由于小报的传播而闻名于世了。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日的《顺天时报》上登载了一条题目为《宣统怕熏皇后》的消息，内容滑稽可笑。其文云：

地安门外帽儿胡同门牌十二号，居住者系一炸麻花作坊，每日不分昼夜工作。但炸麻花冒出的油烟飞扬熏鼻，附近一带气味煞是难闻。惟该作坊与清宣统之未婚皇后府邸紧相毗连，以致该府所受影响较他处为尤甚。虽欲将其驱逐，卒因碍于约法上赋予人民居住自由权之规定，故不克如愿。事为宣统帝闻悉，深恐此项油烟有碍卫生，熏及皇后头脑。故于昨日密谕内务府，令优给该麻花作坊迁移费，劝其迁往他处营业，以期两便云。

现在，象这种消息只能作为趣闻姑妄听之了，至于它是否属实已经无从稽考。不过，就在报纸登载那条消息前后，“帽儿胡同荣宅因清室宣统帝大婚之期在迩，銮舆出入诸多不便”，曾“动工改修”，兴了一番土木，把“荣宅”升格为“荣公府”（荣源在女儿中选后即被封为“承恩公”），这却是当时就核实了的事实。

此后不足半月，婉容的两位胞兄也得到了实惠。报上发了《皇亲得赏参领》的消息：

清皇亲荣源因伊子润良、润麒二人得赏护军参领，昨初四日早晨进内谢恩。

不久，报上又登出荣家将为皇后的生日大肆操办的消息。题目

是《清后千秋》：

阴历九月二十九日为清后千秋，虽尚未入宫，然受贺礼节与已入宫之皇后同仪注。千秋日当然受贺并召梨园子弟入后邸演戏，而后之父母兄弟皆得邀赏听戏之荣。闻余叔岩、杨小楼等奉召入内演戏云。语云“随夫贵”，此之谓也。惟女子命中有此种依人富贵之运，去年今日相去若天渊矣。

看来，整个荣家都因女而获实惠了。如果说这是荣家的“幸福”，那么，这幸福不正建筑在女儿的痛苦之上吗？当然，这一点是在十五年后才逐渐看得分明的。

婉容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得到迎娶皇后礼遇的女性。这种礼遇主要有以下几项：纳采礼，即皇帝派人把采礼送到女家，是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旧历九月初二日巳刻）举行的；大征礼，即皇帝派人到女家告知成婚日期，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旧历九月二十四日巳刻）举行的；册封礼，即皇帝派人到女家送达“宝册”，从此，婉容便有了皇后身份。此礼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旧历十月十二日丑刻）举行的。这些礼仪都有一大套相当隆重的繁文缛节，这里，我们就不去细说了。但是，最后的大婚迎娶之礼，是应该详尽交待一下的。于是，我从当年的报导中选择了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其中一篇着重报导了迎娶之礼的外观和规模；另一篇则着重报导了皇后在迎娶中的活动。因为都是新闻记者在现场采写的新闻，比较详尽又真实可靠。

一篇报导的题目是《清帝婚礼之所闻》，登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的《实事白话报》上，摘录如下：

旧历十月十二日夜（即十三日上午十二钟），清室恭迎皇后，自东华门中门出。门上钉有门神（即神荼郁垒），神武门、景运门、乾清门皆有门神。彩饰门首扎一大彩场，场柱以黄绸扎作龙形，左柱悬一红纸牌，上书“观礼、庆贺人员均由神武门出入”

字样。门之左右，装水月电灯四个，并有军警两排在此守卫（着大礼服）。

迎亲次序，首先为步军统领衙门马队；次为警察厅马队；再次为保安队马队；再次为军乐两班；再次有黄缎银顶轿一顶，黄缎银顶车三辆（无人乘坐），銮驾七十二件，又黄亭四驾（亭有装印凤冠霞帔等），宫灯六十个，清室官员暨民国军警方面派去照料人员等；其后为警察保安队，步军统领衙步队，又军乐队两班；后为正、副天使（正为庆王、副为郑王），一捧圣旨，一捧圣节；最后系皇后所乘之金顶凤舆（三十二抬），左右前后除民国军警护卫外，更有清室官员三十二名随从。

由东安门出北向，经北池子，往西北进三座门，过景山东街，出地安门中门地安门大街，入帽儿胡同，西至皇后邸。

邸门扎彩场，后父、后之兄弟等已在门外跪接圣旨、圣节。后之父兄随天使后入内，凤舆亦一同入内。

约十分钟之久，即出帽儿胡同东口，走南锣鼓巷向东，经北皇城根宽街，南行过大佛寺、马市大街，至丁字街向西，进东安门大街，渡桥入东华门，时为三点四十分。

经过路线以黄土垫道，马路两旁满布军警，沿途观者有数万，更有无数汽车、马车、洋车之中外男女等前往参观。

清皇后凤舆出宫时为整十二点，出宫以前，宣统升乾清宫，送凤舆。又王公大臣派往后邸者，皆乘朝马从神武门出，先至帽儿胡同。

庆贺瞻礼人均登名簿，第一入者为溥珣，最后者为聂宪藩，共有二百三十七人。其中西洋男女瞻礼者约二十余人，中国女子三人，议员约二十余人。武员著民国大礼服及文职著燕尾服者约二十余人。其他或系清室官员，或系旧臣遗老，均著清制礼服。

景运门两旁皆燃羊角双喜字立杆灯五十对，南路铺厚棕地毡，转至乾清门，并有仪仗器具。普通观礼人员及外国人均在景运门外。

另一篇报导的题目是《清帝、皇后举行大婚礼之仪式》，登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的《小公报》上。摘录如下：

旧历十月十三日寅时，清室溥仪仍照皇帝制度举行大婚礼，民国大总统及外省大吏，遣使送礼致贺之盛况仍自可观。兹闻昨日大婚礼奉迎皇后入宫之仪式如下：

宣统于子时升乾清宫，遣派使臣及福晋、命妇四人，率领女官，敬陈御笔用宝龙字如意，安设于凤舆内正中，毕；敬诣坤宁宫东暖阁，铺设龙凤喜床；复将珠宝金银米谷

等物装入宝瓶内，将宝瓶安设龙凤喜床上正中，俟皇后入宫降舆时，由福晋敬谨将宝瓶递与皇后；福晋、命妇等各执如意一柄，安设喜床四隅，毕，即率女官等出神武门。

至皇后邸，请皇后梳双髻、戴双如意、御龙凤同和袍。俟凤舆至，福晋等燃藏香，向凤舆内熏绕一匝，复熏盖头（即锦帕），毕。将凤舆内如意移置于旁，请皇后执苹果、如意、搭盖头升入凤舆，由首领太监垂放舆帘，请凤舆出后邸，循路线入宫。

斯时，清帝御龙袍褂，在乾清宫西暖阁等候。迨凤舆至时，御前王公大臣率侍卫等，引帝至坤宁宫东暖阁。

王公等各退，乃由福晋、命妇等，率女官、太监等至凤舆前，请皇后降舆。福晋接皇后所执之苹果，递宝瓶于皇后。然后由福晋等搀扶皇后，而女官等在前执珠灯导引，由交泰殿至坤宁宫东暖阁内。

福晋等由皇后手内接受宝瓶、苹果，伺候帝揭皇后头上盖头，毕。请帝坐居龙凤喜床上左面，再请后坐喜床右面。女官先设金盆于喜床上，以园盒盛子孙饽饽，进请帝、后同食，毕。福晋等请后梳妆上头，仍戴双喜如意。加添扁簪及富贵绒花，戴朝珠，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并有结发侍卫夫妇在殿外唱交祝歌，毕。女官撤宴桌，福晋、命妇等请帝、后御龙凤喜床上面，向东南方行坐帐礼，毕。女官仍设金盆于喜床上，福晋等再请帝、后进长寿面，毕。礼成，遂退出宫云。

又十四日早，内监执事人等俱在坤宁宫殿外伺候，福晋、命妇四人敬诣东暖阁皇上、皇后前，呈进果茶，毕。福晋、命妇率女官伺候皇后冠服，毕。出东暖阁，请皇后捧柴，由福晋等交结发萨满收存。

捧柴毕，皇上御龙袍龙褂。内务府预设天地桌，陈设如意，供香烛、香斗、苹果于坤宁宫明殿内；北向设喜神桌，向东北方喜神方位如意供香烛香斗，与天地桌同，俱铺设拜褥。福晋、命妇四人，伺候皇上诣天地香案前上香，福晋等递香。

皇上上香毕，同皇后向天地香案前行三跪九叩礼。次诣喜神桌上香，同行三跪九叩礼。

行礼毕，皇上、皇后在东暖阁少坐，内监撤香案，另设灶君香供香炉案，请皇上、皇后同诣西案北案前行三跪九叩礼，次同诣灶君前上香行三跪九叩礼。

内茶膳房预备团圆膳桌于坤宁宫殿门外，女官恭进膳桌。福晋等请皇上升东暖阁北床上居左，皇后升东暖阁北床上居右，平座，同进团圆膳，毕。女官撤膳桌，礼毕。

其他许许多多没有皇后参加的礼仪，就省略不叙了。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是婉容以皇后身份第一次抛头露面的日子，那天上午十时，婉容身穿满族旗袍，梳起高高的“两把头”，和穿戴龙袍珠冠的溥仪一起，在东暖阁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关于这次受贺的情形，在当时的英、美等国报纸上都作过绘声绘色的报导。

有位英国记者在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乾清门前的奇观之后，又细腻地叙述了他沿着夹在白石栏中间的甬道进入乾清宫殿内所看到的情景：在光线稍嫌暗淡的大殿之内，横摆着长长的西式几案，上面陈放着美酒佳肴。在大殿右侧有一面非常高大的银嵌着明镜的木雕屏风，参加贺礼的人们便由这屏风之后鱼贯徐行，进入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那便是皇上与皇后接见外宾的地方。那个房间似乎没有多少华丽的陈设，只有临窗的炕上摆着黄色的坐褥。皇上和皇后向门而立；有四、五位年老的清朝官吏站在他们身后；而庄士敦先生穿着阿斯福大学硕士的特制衣冠，站在皇上身旁，介绍来宾的姓名和身份。皇上身材适中，而显得稍稍瘦弱些，身穿白色锋毛的红青袍褂，上肩下裳都有团龙补服，冠戴平常。皇后比皇上稍矮一点儿，仪态容貌都非常美好。梳妆为满洲式，高高的发髻之上满是以点缀的绒花。她穿的是一条很平淡的黄缎织花旗袍。当外宾一一向皇上、皇后鞠躬之后，一位老臣站到大殿宝座旁边开言道：“皇帝陛下将要出来向诸位先生致辞。”随后，皇上便率领诸臣走出内室来到宝座之前，从衣内拿出一张小纸条，用英语读道：“朕见各国代表咸集于此，甚为欣悦，热烈欢迎。朕祝诸君同享健康与幸福！”说完，举起斟满香槟的高脚酒杯，对宾客们致意，遂出宫去了。

有位美国记者更为详尽地报道了皇后的仪态。他说，当天上午

十点到十一点中间，英、美、法、意、荷、比等国公使及官员、侨民共三百余人，进宫庆贺新婚的皇上和皇后。这个时候就好象大清帝国犹存一般。来宾们先向皇上鞠躬，再向皇后鞠躬。这位美国记者又说：我看皇上和皇后与平常人相比也没有更特殊的地方。在尊严无比的气氛中仍持有一种坦白和易的态度，亲见的人没有不深为感动的。皇上固然是常常接见外人的；皇后则向处深闺，从来没有这种机会能够见到有这样多的外宾济济于一堂啊！这位观察细致的美国记者又说道：不过，皇上和皇后在受贺过程中有两次，其行为是与尊贵的身份稍有不符的，一次是当皇上看见曾给他诊过病的狄博尔时，用英语招呼了一声“狄医生”；另一次是当皇后看见女教师英格兰女士时曾以微笑相答。按这位美国记者的标准，皇后只好板起面孔作人了。

据说溥仪对他圈选的皇后还是挺喜欢的，婉容未入宫时，常常接到来自养心殿的电话，皇上对她表示关心，与她絮絮长谈。

可是，婉容入宫的头一天就和溥仪闹了一点儿小小的别扭。事情是这样的：按旧例，于大婚前一日入宫的淑妃，要在皇后降凤舆之际，亲率女官及秀女等在坤宁宫外行跪迎之礼。可是，宣统皇帝对这种旧礼制颇不以为然，这位常常阅看新文化书籍的帝王，也多少受到人权平等说的熏染，认为后与妃虽有称谓之别，然而，究其实不过是二女共侍一夫，无须尊此卑彼，于是，特宣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之礼。这下可惹了祸了，据报导：

此旨一传，皇后大为不快。是日晚间，竟一怒而实施闭关主义，拒宣统无得入闺房。一个洞房花烛夜，竟独自一人冷冷清清过了一夜。宣统亦无可奈何，只得在养心殿宿了一夜。一对小夫妇，开场即演一齣闹把戏的故事。这还不算，次日正值帝、后偕到太妃宫中朝见太妃之期，后竟执意不从，和宣统使起性子来了。遂令一对新夫妇竟乃郁

郁寡欢闹到如今，此亦帝室大婚中之轶闻也。

溥仪降旨免除淑妃跪迎之礼这是事实，新婚之夜皇后独眠这也是事实，然而，这两件事实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那就不得而知了。报导的说法姑且聊备一格吧。

不过有一点则完全可以断言：曾受过“学堂”教育的婉容，是坚决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对此，当时的许多洋人都曾以赞美的口吻著文予以宣扬。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与其说她反对免除文绣的跪迎之礼，还不如干脆地说她反对册立文绣为妃。她不满意的并非是文绣的失礼，而是文绣这个人。后来，文绣离婚、婉容被贬，都从这儿看出了兆头。

婉容婚后在紫禁城里生活了将近二年时间，那时，她住在储秀宫里，文绣住在重华宫里，而溥仪仍是在养心殿中独睡。他们之间相处得还好。虽说婉容霸道一些，文绣还能容忍。当两人之间发生矛盾或勾心斗角的时候，皇上总是偏袒婉容，文绣生气也只好往肚子里咽。

有一本书在谈到婉容的北京宫廷生活时，说她“打扮得很漂亮，开汽车，坐摩托脚踏车，讲英国语，有种种招摇的行动……大有明星皇后的资格。”这未免有些夸张，不过，当年的婉容确实是很“摩登”的。

据说婉容入宫之前常常到真光电影院看电影，有次看外国影片《多情皇后》，当演到淫乱的情节时，婉容就十分不悦了，不待剧终便拂袖而去，这说明正统思想在她头脑中还是很牢固的。

说到婉容能开汽车云云，令人难以置信。婉容很喜欢骑自行车倒是真的，作为一名蒙族姑娘，她也能骑马，在宫中和天津时都骑过。她有一匹属于自用的四川好马。直到伪满初年婉容还曾以三百

八十二元的高价，置办了一副黄绣缎的鞍鞯，这是体现在内司房“上用出入银钱流水帐”帐面上的事实。

至于英语，婉容入宫不久便延聘一位美国牧师的女儿师盈女士教授英文。以后又改聘美国女教师任萨姆。婉容的英文学得很不错，不但能用英语讲话，而且能用英文写信。她在宫中用英文给溥仪写过大量的短信。这一对年轻的皇家夫妇，同处深宫之中，每天见面，却还要用英文通信，其信的内容当然可想而知的。婉容给溥仪写英文短信的时候，落款总是用溥仪给她取的、与英国女王相同的名字：伊丽莎白。

溥仪也同样支持文绣学习英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群强报》上登出这样一条消息：

清宣统因淑妃不会英文，现已聘定英文专家、中国人凌女士为教习，不日进内宫课。

溥杰回忆说，溥仪大婚之后，每天下午，在神武门内又增加了两乘二人肩舆，这便是婉容和文绣的英文教师所乘坐的。

婉容不但常给溥仪写些抒情的英文短信，而且教会了溥仪吃西餐。西餐，当时称作“洋饭”。作为中国的帝王，溥仪完全不懂这“洋饭”的“进”法。他回忆说：

回想起来，第一次吃西餐那是很可笑的。我叫太监到六国饭店（今东交民巷新侨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罢！”店里要派人来摆刀叉什么的，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见一碟黄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一尝！”他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我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

婉容竟把溥仪从这个水平线上，教到会吃、爱吃，直到特赦以后还很喜欢西餐的程度。

这样一位讲英语、吃“洋饭”、欣赏西方艺术的贵族千金，怎么能够受得了宫墙的禁锢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她和溥仪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从自己狭窄的生活中走出去。溥仪回忆那段历史时说：

这时我已渐渐对于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由于“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正正堂堂的“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后则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的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开开眼界”么，达到了这种愿望，便心满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颐和园时，曾命司机把汽车加速开驶，在我屡次催促之下，竟达到每小时六十一—七十公里的速度。这时可把随我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吓得他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一，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溥仪回忆的情形完全不差。我翻阅了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两年的旧报纸，从大量的有关报导中，经过反复印证，我认为下面摘录的数条新闻可以说是准确无误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皇帝和皇后宫廷生活的一斑。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群强报》登载了《宣统赴醇邸探病》的消息：

清醇王老侧福晋现在患病，清帝特于三十号上午十一时，携带皇后、淑妃，同乘汽车出宫赴德胜桥醇王府探病。是日，涛贝勒司机、御前大臣泽公及内务府大臣绍英等随护，至晚四时还宫。